

试论曹丕的文学思想

顾 启 姜光斗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光辉灿烂的时期，众多的作家写出了光彩夺目的文学理论著作，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曹丕是其中可注意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写出了我国的第一篇文学专论：《典论·论文》。此文和他的其它涉及文论的作品，论述了文学理论的几个根本问题，提出了指导文学创作的一系列宝贵意见，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

曹丕的文论著作除《典论·论文》专著外，其它涉及文论的作品尚有《与朝歌令吴质书》、《与吴质书》、《再与吴质书》、《与王朗书》、《典论·自序》等等。综观其文学成就，在理论上的贡献大大超过了诗歌创作。

他的文学思想，首先是肯定了文学的地位、价值和特点。根据孔丘“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主张，承继《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的观点，曹丕本着文以致用精神，明确地指出了文学和政治的密切关系：“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当时，曹丕所说的“文章”就是指诗、赋、铭、诔、散文等文学作品。罗根泽师据此论断：“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①

本来，在两汉，人们一向崇拜“经学”，中国社会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到了汉末，君主屡迁，国家分裂，儒家尊君大一统的思想行不通了。于是一向受“经学”羁绊的文学才卓然独立，成为文人的一种专业。所以鲁迅先生才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②曹丕坚决抛弃了《左传》轻视“立言”的观点以及灵帝时保守派首领杨赐指责文士是“群小”，是“欢取兕、共工”，另一首领蔡邕辱骂他们是小才、是俳优的说法。他已经充分认识到文学可以为“经国”的政治服务，好的作品具有不朽的价值。“不朽之盛事”是以“经国之大业”为前提的，从而鼓励文人为曹氏的统一事业努力创作。他教诲文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种对文学独立地位和文学特点和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基于上述认识，曹氏父子“外定武功，内兴文学”^③。重用的人首先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其次就是文学之士。他们对四海名士几乎网罗无遗，连远陷南匈奴的女诗人蔡琰也不惜以“金璧赎回”。当文人到来之后分别委以重任，赐以“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的款待。不仅要文人咏诗唱和、撰写辞赋，起草军国檄

文，而且“立太学……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④”。其目的就是以文学为武器大造舆论，为结束分裂的局面服务。曹丕本人之所以“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⑤”，并且要吴质等文人“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勉励大家抓紧时间写作，甚至盼望文学青年迅速成长，说“后生可畏，来者难诬”，都因为对文学的社会价值有了自觉的认识。

其次，文人要写出好作品，必先“以名节自立”。曹丕要求文人在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保持节操，珍惜荣誉，作为创作的基础。在《与吴质书》中，他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很明显，曹丕首先肯定了徐干的“名节”，说他不慕利禄，不尚虚名，严于律己，检点细节，然后才写出名著的。从这一点出发，他和弟弟曹植多次表扬建安七子，说他们“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⑥”，而能“以此相服，亦良难矣”，赞扬七子“文人相亲”的美德，以及“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相互学习的精神。

曹丕也猛烈抨击了文人在“名节”上存在的问题，以引起疗治之注意。如文人相轻，骄傲狂妄，背弃实际，向往虚名；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苟安懒惰，“富贵则流于逸乐”；“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不护细节”，放浪形骸，等等。针砭时弊，切中要害，千百年后，犹不失其风力。

在这方面，曹丕还身体力行，为文人树榜样。《致王朗书》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他同样将立德放在著作之先。虽然他在政治上、军事上远逊其父，但也还制订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措施，如令宦人为官不得过署，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位，轻刑罚，薄赋税，重视农业，力求俭朴，较关心民生疾苦，“夫事不可谓己长”，注意听取部属意见，对文人态度谦逊。对他来说，这就是“赞扬丽质”、锤炼名节了。所以郭沫若称他是“一位旧式明君的典型^⑦”。

当然“名节”说，也是有渊源的，前人论述不少。司马迁和王逸等人就热烈赞扬过屈原，如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孔丘也说过：“有德者必有言。^⑧”曹丕的功绩是，把文学创作中的这一重要问题提出来作了专门研究，从正、反两面作了精辟的论述，而且否定了孔丘“有言者不必有德^⑨”的提法，起到了“正视听”的作用。

再次，谈作家的气质、个性决定作品的风格，提倡作品的独创性。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所说的“气”，在作家本人，是指气质、个性；反映于作品，则为艺术风格。曹丕并举其要者，说“气”有清（豪爽刚健）、浊（舒缓沉郁）之别。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说：“才有庸雋，气有刚柔”，沈约称赞谢灵运“刚柔迭用，喜温分情”，都要求作品中需有作者的个性在。杜甫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钦佩他们的诗作有独特性。直至清代性灵派首领袁枚，还批评王士禛的神韵说：“阮亭主修饰，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⑩”今天，我们也坚决反对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创作歪风，提倡各种艺术风格、艺术流派的发展。所以朱东润称赞：“此（指丕说）为自古以来论文气之始。^⑪”

至于结合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曹丕条分缕析，“气”就显得翔实了。在《论文》中称徐干“时有齐气”，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钟嵘《诗品》也说他“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而《颜氏家训》介绍其个性特点是“屈强输作^②”，此公之旷达粗心可见一斑）孔融“体气高妙”（刘桢也说“孔氏卓卓，信含异气”。颜氏介绍他“诞傲致殒”）。在《与吴质书》中说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颜氏论其个性为“实号粗疏”），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此指桢作文如乘良马，极其奔放；然不能勒制，致使流乱脱轨，正与其个性吻合），王粲“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颜氏说他“率躁见嫌”）只要浏览《昭明文选》、严可均编《全三国文》和丁福保辑《全三国诗》中这些作家的作品，择要品味，不得不承认曹丕的论述精详、属词严正了。如徐干的气质和个性是“恬淡寡欲”、心平气和，表现其作品的就是“时有齐气”，他总是徐徐图之、侃侃而谈，既不金刚怒目，亦不喜形于色。试读他的名篇《室思之三》：“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词。飘摇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离皆复会，君独无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③”写战乱中女子思念丈夫，徘徊缠绵，诚挚感人，但诗的风格亦如静静的“流水”，是平和的、舒缓的，可谓“怨而不乱”。这真是“诗如其人”了。在一千七百多年前，曹丕即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强调作品一定要有特点和独创性，实属难能可贵。后来，刘勰，韩愈以及苏轼兄弟在这方面都有论述。鼓舞无数作者为攀登文艺高峰而呕心，为创造自己的艺术风格而沥血，曹丕的贡献是极大的。

当然，曹丕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有其片面之处。当年孟轲就说过“气”（他指人的内心道德）是可以“养”成的，也就是肯定了主观能动作用。曹丕所说的人的个性，应该承认有相当的先天因素，但主要还得力于后天实践。作家总受时代制约，个性在其政治道路、社会关系、所遭际遇中逐渐熔铸而成，加之自己的生活积累、文学修养、艺术爱好、写作经验……这一切汇合到作品中才形成独特的风格。作家风格的形成要经受无数艰苦的磨炼，只要不畏劳苦，是可以“力强而致”的。“生活会培养出风格来的。^④”

复次，谈文章体裁的特点和要求。曹丕说：“文非一体”，“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细心辨析，就发现他将文体分为十一目，即：奏、议、书、论、章、表、记、铭、诔、诗、赋。

文体分类并非曹丕首创，孔丘谈到诗，班固论过赋，蔡邕言及诏令、奏议和铭诔。但曹丕论到这几种文体的特点和要求，却超过了前人。他说“文本同而末异”，既指出各种文体的写作要求有共同性，又指出有差异性。由于效用不同，奏、议、书、论等无韵之笔要求雅、理，铭、诔、诗、赋等有韵之文应该实、丽。“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这些要求比较符合所论文体的特点。关于“诗赋欲丽”，历来有些争论。执此者说，这是曹丕反对当时那些寓教训于诗赋的见解；非彼者说，这个“丽”字开了南朝齐梁诗形式主义的先河。倘若我们顾及建安时期的社会状态和文学潮流，可以将它理解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而不是“辞人之赋丽以淫”。虽然如此，曹丕还是应该负相当的责任，一是他既未将“丽”字的概念诠释清楚，齐梁作者们就将这个“丽”和宫苑“美”、宫妇“丽”混一了。二是大批文人来邺下前，诗作大多充满慷慨之音，是“丽以则”的；来归之后，各各度过一段时间，由于脱离劳苦民众，唱和应酬的苍白无力之作渐次增多，是“丽以淫”的。后者尽

管很少，但对后代产生不良影响。这也是应予承认的事实。

虽然如此，曹丕冲破前人樊篱，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提出本末结合的看法，对后代文体研究推动很大。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李充的《翰林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发展了曹丕的文体论思想。

又次，谈开展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曹丕揭示了文学批评中易犯的两种毛病，一是“文人相轻”，“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只看到自己作品的长处和别人作品的短处；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尊古卑今，迷信虚名而不重实际，不能实事求是地评论作家和作品。

紧接着分析病源。首先，文学作品不是一种样式，很少有人能精通全部样式。这样，有的就以自己擅长的瞧不起他人。其次，“文以气为主”，各人的气质、个性、作品风格不同，因此就互相攻讦了。

再开出药方。先表扬建安七子，尽管文章风格不一、文体专长各异，都以自己的特长“仰齐足而並驰”千里，皆为著名文人；但他们“以此相服，亦良难矣”。这种健康爽朗的风气与“文人相轻”的陋习完全相反，理应称赞以树榜样。继以邺下文人集团实际领袖的身份，带头开展文学评论。在评价作家和作品时，“审己以度人”，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力求做到正确公允。比如，他肯定王粲的辞赋写得好，说《登楼赋》等是代表作。这些代表作，就是张衡、蔡邕的作品也不能超过。又指出王粲其它体裁的文章就没有他的辞赋好。就是对王粲的辞赋也指出气魄不足，风格纤弱等缺点。尽管曹丕除徐干外，对其余六子皆有微词，但总的说来，他的评论既有一定的标准，又有朴素的辩证方法，七子的作品有优点，有缺点，有长处，有短处。曹丕是站得较高看得较远的，为后世的文学评论开了良好的风气。

当然，“文人相轻”的根本原因是个人主义作祟。这一点，曹丕在他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看到的，我们不应苛求古人。值得注意的是，曹丕指出的文人的这种积习、恶习、陋习，直至今天仍在某些人头脑中搅动，这倒使我们不得不钦佩他目光的敏锐和犀利了。

最后，提倡学习乐府民歌和运用通俗语言。这一点可以从曹丕诗作明显的歌谣化倾向得到验证。曹植说过：“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⑧他们父子、兄弟间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

曹丕的诗作常常从“闾里小事”取材，从不同侧面反映社会现实，跟民歌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相通。“居世一何不同？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行》）客观上暴露了社会贫富间的尖锐对立。《黎阳作》写乱后悲景，伤心惨目。《艳歌行》、《杂诗二首》、《善战行》都是“悯征戍”、“悲行役”的。这些作品估计是他少年时，随父出征，见到了“百姓死亡，暴骨如莽”的惨景后写的，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其中有的是受乐府民歌的启发写成，有的则是直接模仿乐府民歌的产物。曹丕还有更多的诗是歌咏男女恋情的，《钓竿》、《秋胡行》等篇显著地受到民歌的影响。

从形式上看，集中四十三首诗，过半是乐府体，有的题目就是民歌的曲名，象《陌上桑》、《短歌行》等等。四言、五言、六言、杂言等民歌句式，他都试用过。其中《燕歌行》二首，受汉谣谚七言句子的影响，成为我国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陌上桑》三三七句式也脱胎于歌谣。《大墙上蒿行》长达三百六十四字，长短交错，纵横捭阖，气势恢宏。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

曹丕的诗努力采用口语，明白如话。他是据王充“文犹语也”的观点写作的，所以钟嵘在《诗品》中说：“子桓诗百余篇率皆鄙质如偶语”。如“长兄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小弟虽无官爵，……往来王侯长者游。”跟乐府民歌中使用的口语几无差别。有时，他引用民歌的现成句子。象《艳歌何尝行》中的“上惭仓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出于乐府曲《东门行》；而“但当饮醇酒，炙肥牛”，又引自《西门行》。

曹丕的诗作是折光镜，折射出他反对汉大赋、摆脱“古诗”束缚、从民间文学吸取养料、创造新诗歌的进步文学观。

此外，曹丕深知创作艰苦，十分尊重文人。他以“副君之重”、天子之尊，却跟许多文人建立了朋友关系。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上倒是很有一点民主作风的。他的《叙诗》篇说：“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楨、阮瑀、应瑒称同作。”他鼓励文人创作，引导他们不走邪路。他抱着“世人著述，不能无病”的态度，在唱和申请文士批评自己的作品，象他弟弟曹植一样“有不善，应时改定”。他和文人“並见友爱”，“同声相应”，感情是融洽的。后来孔融被诛，阮、徐、陈、应、刘等五人接连不断地相继陆续俱逝，王粲也病死了。曹丕在写给吴质的三封信中，对这些名士的先后离世深表哀悼，抒发了深深的怀念之情。他谈及此事：“言之伤心！”因感情真挚动人，这些成了我国书信文学的名篇。公元三世纪初的封建帝王竟跟文人建立了这样的关系，当然会促进一代文学的发展了。同时代的吴与蜀在文学上差不多等于荒园，不就是有力的旁证吗？

曹丕奖励文学，还能做到不因人废文。孔融被曹操杀掉后，他出重金买融之遗文，“都为一集”。刘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赋数十篇。”这告诉我们，曹氏父子是文网不严，保证创作自由的，使诗人有大胆唱出自己和人民心声的机会。

二

曹丕的丰富的文学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它是建安文学革命的产物。原来，到了汉末，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大赋已陷入绝境，连扬雄也不满意它“讽一而劝百”的作风，追悔说：“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在乐府民歌鼎盛的同时，文人诗的创作甚为寥落，尽管《古诗》显示出相当高的艺术技巧；但是由于作者大都为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不接触社会底层，未碰到社会最尖锐的矛盾，因此只能发出一些苦闷的乃至人生无常的叹息之声，基调低沉。在我国文学发展濒临危难的情况下，建安文人起来斗争。他们为了反映惊涛骇浪的时代、复杂的社会现实，表达要求政治统一的愿望，就坚决果断地舍弃汉大赋过分追求艳丽的辞藻没其讽谕之义的歪风和文人诗苍白无力的内容，革形式主义之命，将虎虎有生气的汉乐府民歌推向前进，使诗歌重又闪发出批判、战斗的锋芒。看，“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斩截无子遗，尸骸相撑据……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蔡琰）“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应瑒）这些佳句描绘出一幅幅“有声的画”。抒情名篇，曹丕的《燕歌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的《悲愤诗》等诗文，脍炙人口，历久弥新。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当时那个时代翻卷的风云，诗人自身的不幸遭遇，对人民受战乱荼毒的深切同情，闪烁着夺目的现实主义光

辉。由于具备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真情实感，吸收了民歌精华显示出质朴无华、刚劲有力的语言风格，所以刘勰赞扬：“观其时文，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並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⑱”这就是历代盛赞的“建安风骨”。建安诗歌的现实性、抒情性和通俗性，对后世影响很大。例如唐代诗界革命的旗手陈子昂、李白就以之为武器，横扫六朝浮靡淫侈的诗风，为唐诗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安诗歌创作的丰收，诗人的宝贵经验，两种诗风的生死搏斗，为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孕育了曹丕的文学思想；灿若群星的众多作家，也急需理论上的总结和领导。当此之际，身为邺下集团真正中心和实际领导人物的曹丕就升起了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颗明星——《典论·论文》，写出了一批涉及文论的作品。

其次，曹丕的文学思想是对前代零星文论的继承、总结和发展。以往，文、史、哲著作间无明显界限，在先秦诸子和两汉人的著述中，有一部分并非专论文学的，但它们在理论上却和文学相通，产生了影响。仔细探源，曹丕承继之迹亦甚明确。诚为鲁迅所言，新的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采取。^⑲”

曹丕在《典论·自序》里说，他生长在戎旅之间，善习武，从征战。其父“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他耳濡目染，也“少诵诗、论，及长而各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曹丕的文论作品确实从孔丘论诗，孟轲论气，庄周论轮篇（“臣不能以喻臣子，臣之子亦不是受于臣”），荀卿、墨翟和韩非论文章作用，史迁强调愤思出诗人，王充强调创新，《毛诗序》总结了诗歌的特征和感化作用，扬雄论汉赋弊病和文道合一，以及班固、王逸等人的著作中，吸取了他认为的精华，舍弃了他认为的糟粕，结合建安文坛实际，融会贯通而写成的。

再次，曹丕文学思想也包含作者本人创作经验的结晶在内。刘勰说：“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憎焉。^⑳”曹丕既搞理论研究，又搞文学创作，是一位诗文能手，这对他认识、总结文学规律大有补益。

他的诗“洋洋清绮”，注意向民歌学习，上面谈过。他的散文，特别是书信，感情色彩浓重，叙事说理简约，文笔清秀秀美，语言流利婉转，历来备受赞誉。可以想见，曹丕在创作上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因为他深知创作甘苦、通晓个中三昧，由他来评价作家、作品，当然如庖丁解牛而游刃有余了。因此，曹丕的文学思想也是在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任何思想都受时代制约。“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董卓乱后的战乱年代，千枝竞春、万葩齐放的文学复兴时期，哺育了曹丕的文论作品。明乎此，看似偶然的现象却又反映出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了。

上面，我们试论了曹丕文学思想的内容及其形成。溯流而上，游览了我国悠久的文学批评史的源头之一，大大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没有灿烂的昨天，就不会有光明的今天；探讨古代文论，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无产阶级美学。批判地继承曹丕的文学思想，对加强文艺作用的认识，发扬艺术民主，鼓励各种艺术风格、艺术流派的发展，正确开展文艺批评，向民间文学学习，在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实现重大转变，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学 术 简 讯 (三则)

△在我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中,政治系讲师庞承启同志作了两次学术报告:《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学术报告驳斥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几种责难,阐明了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促进了全校的学习。

△中文系讲师吕苏同志在全校学术报告会上作了题为《教学的社会本质和发展学生智力问题》的报告,就教学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教育学、教学论的研究有一定启发。

△中文系配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举办了如何正确评价《水浒》的学术讨论会。十几位师生在大会上发言。大家对《水浒》的思想倾向、创作方法、人物形象等问题发表了意见,集中讨论了如何评价宋江、起义军接受招安及悲剧结局问题。大家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大大活跃了学术空气。

- ①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
- ②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 ③《三国志·荀彧传》
- ④⑤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 ⑥⑬曹植:《与杨德祖书》
- ⑦郭沫若:《历史人物·论曹植》
- ⑧⑨《论语·宪问》
- ⑩袁子才:《随园诗话》
- ⑪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 ⑫转引自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312页(一九六二年版)
- ⑬萧统:《文选》
- ⑭《加里宁论文学》(一九五五年新文艺出版社第一版)
- ⑮见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 ⑯扬雄:《法言·吾子》
- ⑰《文心雕龙·时序》
- ⑱鲁迅:《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
- ⑳《文心雕龙·才略》
- ㉑毛泽东:《实践论》